

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迎来建院 90 周年,原院长王祖承回望来时路

用 60 年,写一封给“600 号”的“情书”

精神病医院里“都是人才”

1964 年,23 岁的王祖承从上海第二医学院(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)医疗系毕业。彼时,精神科前景不被看好,医学院毕业生大多不愿去精神病医院。王祖承至今记得同学们的顾虑:“有人怕和患者沟通困难,可能会挨骂、挨打,还可能有生命危险;有人觉得精神病医生没有技术含量,不算正规医生,更像做思想工作的;有人担心自己工作后会被‘感染’,变得孤僻怪异,与社会脱节。”

而王祖承是主动选择精神科的。在医学院求学时,严和骏、顾景顺两位老师的精神病学课程,改变了他对这一学科的认知。严和骏讲课条理清晰,将复杂病症拆解成易懂知识点;顾景顺用带着无锡口音的上海话“说书”,一次讲到强迫症患者的犹豫不决时,他把粉笔当点燃的香烟,模仿患者“朝左吹不行,朝右吹也不行”的焦虑模样,引得课堂阵阵笑声。王祖承意识到,原来精神病学可以这么有趣,“不是枯燥的理论,而是关乎人的心灵”。实习期间,王祖承在女患者病房参与胰岛素治疗,遇到电影《五朵金花》的编剧之一——这位 5 岁读书、15 岁高中毕业的才女,当时因精神障碍入院,时而哭泣,时而发笑。“大家都说有文艺天赋的人容易患精神障碍,可没人说得清为什么。但她的经历让我觉得,这些患者背后藏着太多值得探究的故事。”最终,王祖承在分配志愿表上写下第一志愿:精神科。

毕业后,王祖承如愿进入上海市精神防治院(“600 号”前身),防治院分为徐汇院区与北桥分院(原普善疗养院,1935 年建成的亚洲最大精神病院)。当时医院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,曾赴美留学的栗宗华院长满怀雄心,大批引进年轻人,除医学院毕业生外,还有复旦大学、华东师范大学、上海科技大学的毕业生,另有中专生、大专生等,一年之中,进院的年轻人有 50 多人。他们充满青春活力,过着集体生活。每周有两晚上集体课,医院安排多位高年资医师讲课,包括严和骏、纪明、殷国宝等老前辈,栗宗华、夏镇夷也定会到场。“那时精神病学知识资料少,很多授课内容是医师的心得体会和经验介绍,大家听课都认真做笔记。我们还开展学英语活动。我原来是学

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,因其地址为宛平南路 600 号,而被市民“亲切”地称为“600 号”。今年,“600 号”迎来建院 90 周年,曾在此工作了 60 年的原院长王祖承教授写下回忆录,从青春到暮年,他记录了自己在“600 号”的故事——这不仅是一家医院,更是一个时代对人们心灵健康的守护与承诺。(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)

◆记者 郭爽



■王祖承,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原院长,曾任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、教授,博士生导师,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。



■王祖承与夫人严幼珍 郭爽摄

俄文的,但没有俄文资料可看,就转学英语。王敦绍医师自告奋勇承担初级教学,大家从‘ABCD’开始学。”

然而,随着国内政治环境的迅速变化,栗宗华被下放劳动,在门诊室扫地。1970 年,栗宗华不幸患病离世,弥留之际,他把房屋、家产、存款全部上交给了国家。

“我们是在龙华医院上班的”

上世纪 70 年代,上海市精神防治院创新构建的“市级—区级—社区”三级防治网络(即“上海模式”),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“发展中国家精神卫生服务范本”。但当时精神科资金不足,“精神病院”名声难听,社会对“600 号”医务工作者普遍有歧视。“以前我们医院的员工都不敢说自己是‘600 号’工作的,都说是街对面的龙华医院上班。”王祖承回忆。

上世纪 80 年代初,我国精神卫生事业面临的是十余年业务荒废留下的空白,对患者的治疗多是“关起来、约束住”,被“生冻”地称为“关押捆绑”。“那时候没有像样的药物,几乎没有对外交流,学术研究更是一片荒漠。遇到躁狂患者,只能用约束带。”当时上海市相关部门调查发现,金山、崇明等远郊县有 129 名精神分裂症患者,因家庭贫困、缺乏医疗知识,被家人用链条锁在猪圈、破屋中,有的甚至被“关锁”数十年。“看到照片里患者在铁栅栏内蜷缩,家属在门外低头垂泪,我们作为精神科医生,真的无地自容。”王祖承回忆道。时任院长严和骏教授带领张明园教授及防治科同事,联合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,免费为这些患者提供长效安定剂“安度利可”(氯喹啉醇癸酸酯旧称)。团队跑遍上海九县一区,为患者送药、检查。

两年后,患者病情得到控制,彻底脱离锁链,“再去随访时,患者和家属在门口热泪盈眶地迎接我们”。而上海的这场“解锁工程”,也为后来全国“686 项目”(全国精神疾病救助康复工程)奠定基础。

1985 年,上海市精神病防治院正式更名为“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”,进入高质量转型期。1986 年,王祖承被选派至日本浅井病院进修。这次出国,为他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——那里没有冰冷的铁窗和锁链,医生会坐在病房里和患者聊天,治疗方案除药物外,还有心理疏导和家庭支持。“浅井病院的老院长浅井利勇说,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‘以德报怨’抚养了 5000 多名日本遗孤,他很感恩,因此资助中国医生来院进修。”进修期间,王祖承接触到森田疗法、内观疗法。“森田疗法讲究‘顺其自然’,内观疗法强调‘知感恩’,这些理念能帮患者从心理层面重建力量。”回国后,王祖承成为将这两种疗法引入中国的关键人物,惠及了万千患者。他还将日本进修时得到的生活费每月拿出 1 万日元(当时约合人民币 250 元,而其月工资仅七八十元),在“600 号”设立“上海—浅井精神卫生奖”。“浅井院长的感恩之心感染了我,我也要把这份善意传递下去。”这个奖项后来成为激励年轻医生的重要平台,他与日本同道的交流也持续至今,促成众多学术研讨与人才培养项目。

1999 年,王祖承被确诊患上肿瘤,此后几十年先后经历 6 次手术。尽管因化疗头发全脱,他却始终乐观。“身体有问题交给专科医生,心不要动,顺其自然。”病床上的他笑着对来探望的同事朋友说。这份豁达,正是从森田疗法中汲取的力量。后来,他还与肿瘤科合作,用森田疗法帮助肿瘤患

者乐观应对病情:“我引进疗法是为了帮患者,没想到后来救了自己。”

王祖承与妻子严幼珍是在“600 号”相识的。严幼珍从护士成长为护理部副主任,两人相濡以沫,携手走过 57 年。1994 年,是王祖承从第二医学院毕业的 30 年,这一年,他的儿子也从这所学校毕业。尽管儿子没选择精神科,他仍尊重孩子的选择。

2023 年 1 月 6 日,夫妻俩都因感染新冠病毒发高烧。清晨吃早饭时,严幼珍突然呼吸、心跳骤停。“我摸她的脉搏,没了;听心脏,心跳也没了。”王祖承立刻施救,脑海里飞速闪过自己毕生所学:“那是我生命中最紧张的时刻。”5 分钟后,严幼珍脸色渐渐红润,苏醒过来。“她和我讲,‘你救活了我,是我的福分,也是你的福分——我还可以继续照顾你’。”

一封给“600 号”的“情书”

2000 年,上海开始筹备《上海市精神卫生条例》,这是中国首个精神卫生地方性法规。“制订时大家都没经验,几轮讨论终成眉目,成功出台。其间,大量文字、资料整理及配套文件书写工作,由谢斌(后任“600 号”党委书记,今年 4 月退休)和其他几位年轻人承担。当时小谢正报考博士研究生,但赶写材料,每天要忙到半夜两三点,根本没时间复习,只好放弃考博。大家都为他惋惜,他却无所谓,说不考也一样工作,这份豁达让人敬佩。”2013 年,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》施行。“它的出台历经艰辛,最早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稿,历经 32 年、修改 14 稿,经数代专家接力。这是中国精神卫生事业的重大进步。”王祖承感慨。

1964 年至今,王祖承见证了“600 号”的蜕变:从封闭病房变成拥有 2200 张床位的现代化医院,从被调侃的地址变成温暖的代名词——“600 号”文创层出不穷,成了热销款;“600 号画廊”里,患者画作在 C 位展出;“600 号月饼”最近几年也成了“网红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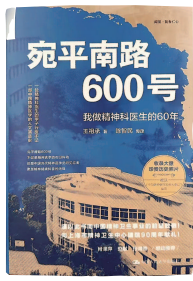
“600 号”的诊疗手段也在不

断升级。王祖承记得一个有趣的诊疗细节:“有个病人一到病房外面就听到声音骂他,不愿出去。我让他把头伸出去一半,他说外面一半能听到声音,里面一半听不到,”他笑着说,“你看,精神病的探索多有趣,一扇门就能引发不同反应,这些细节背后是脑部对环境刺激的反应差异。后来我们结合影像学检查,观察患者脑部特定区域活动情况。我们还做基因、生物学等研究,想找到精神疾病的‘缺口’——比如精神分裂症,以前想找特定基因片段,后来发现没那么简单,它不是单基因疾病,是多基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。”

人们对“600 号”态度的转变,其实是社会对精神疾病认识不断提升的体现。王祖承认为:“患者能被平等对待,是社会发展的必然,也是我最欣慰的事,但这些变化不是一蹴而就的,是几代人熬出来的。”我国精神科医生在上世纪 80 年代不足万人,而据《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 2024》(数据截至 2023 年底),中国精神科执业(助理)医师已达 6.9 万人。但王祖承仍然觉得不够:“按世界卫生组织标准,每 1000 人需要 1 名精神科医生,我们还差得远。而且精神科医生要成熟,至少需要 20 年临床经验,培养周期太长了。”

退休后,王祖承坚持主持“生活发现会”,组织患者朗读、分享康复故事;创办微信公众号“王祖承精神世界”,更新精神医学知识;牵头设立论坛,让老、中、青医生交流学习。直到 2022 年,81 岁的他仍坚持每周四下午出门诊。在青年医生陈智民看来,王老师总是凭借一腔热忱,做许多利于他人的“多余小事”,“他热爱精神医学,当作一生的追求,活成了温润如玉的君子”。

王祖承始终记得栗宗华教授的话:“精神病患者的病史是用血和泪写成的,但医生的使命是让每滴血泪都成为重生的证言。”数十年间,他笔耕不辍,记录、汇总了临床一线的坚守与思考。金秋十月,经陈智民帮助整理,《宛平南路 600 号:我做精神科医生的 60 年》一书出版。他在其中写道:“与整个事业而言,我个人所做的不过沧海一粟。只有把个人有限的生命融入伟大的事业,才能克服生命的局限。”



■《宛平南路 600 号:我做精神科医生的 60 年》(中国人民出版社)



■上世纪 80 年代医院全景



■1954 年,栗宗华等建议将上海的精神治疗资源大联合,于是成立上海市立精神病院,后改名为上海市精神病防治院,2000 年搬入徐汇区的新院区。